

從紀錄片《時代革命》 看香港公民社會 在 2019 年「反修例運動」的體現

蔡慧敏

前香港壹週刊編輯、現為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專任研究助理

引言

到目前為止，周冠威導演的紀錄片《時代革命》（*Revolution of Our Times*）可說是香港 2019 年「反修例運動」最全面的紀錄。反修例運動的背景複雜、枝節繁多。持續超過半年的街頭抗爭僅是冰山一角，水底下的歷史脈絡、社會矛盾和中港關係牽扯極廣。參與抗爭的香港人最少達兩百萬（2019 年 6 月 16 日的遊行人數），且深入每個階層。其模式、動員和運作方法皆前所未見。要深入淺出的陳述其來龍去脈，本來就工程浩大。抗爭者投入這場運動的理由，除了開宗明義的「反送中」、反警暴、爭取民主、捍衛自由等理性原因，有更多是出於情緒和感性。要逐一梳理，除了考驗導演的敘事能力，他更要具備一定的論述能力。

周冠威花了兩年時間、用 152 分鐘把反修例運動娓娓道來，交出一個毫不懶惰的懶人包。在拍攝過程中他與受訪者出生入死，對自己、對抗爭、以至對香港反覆詰問。透過受訪者的經歷，周冠威點出反修例運動最重要的特質：無大台與無面貌（faceless），乃建基於香港強大的公民社會和香港人的自由思想。而公民社會的覺醒，則仰賴於每個公民的覺醒。覺醒不是靈光一閃的頓悟，而是有其歷史脈絡。

《時代革命》2021 年 7 月在法國坎城影展首映後，周冠威寧願面對政治風險，也堅持要留在香港，令他成為反修例運動其中一個代表人物。2019 年香

港的抗爭看似偃旗息鼓，但它早已深入人心，其影響力日後相信會伺機浮現。筆者訪問了周冠威導演，由他剖析《時代革命》的意義。

緣起和目的

《時代革命》源於周冠威在 2019 年 8 月收到的一通電話。一位投資者因為看了他的《十年——自焚者》(2015)，萌生找周冠威拍攝反送中運動紀錄片的念頭。當時香港的街頭抗爭已持續了兩個多月，周冠威每日從網絡直播、新聞報導中觀察運動的發展，參加過遊行，也試過在住所附近的行人隧道建立「連儂牆」。但因為太太正懷有第二胎，身體不適，又要照顧五歲的兒子，加上他另一部作品《幻愛》(2020) 上映在即，令周冠威難負擔上街的風險。那電話成為了推動他走上前線的最後一根稻草。他本來是個「和理非」(和平理性非暴力)，但基於電影人對畫面的要求，他在拍攝現場越走越前。受訪者去哪裡，他就跟到哪裡，「我是因為走出來才生出勇氣，不是因為有勇氣而走出來。這是在反修例運動中領悟到的。」

投資者的原意是讓外國人、對事件背景沒有理解的觀眾，都能夠明白 2019 年香港所發生的事，「我其實沒有把太多前設放在心裡，只是想把電影做好。在創作的過程，我沒有多想『外國人是否明白』。說到尾，電影是讓每一個人觀看，包括香港人或非香港人。如果以 **target audience** 去考慮，是商業電影的策略。我的思維不是這樣。」

雖然《時代革命》在可見的將來都不能在香港公映，但自從在 2021 年 7 月公諸於世後，周冠威收到他意料之外的反饋。其中一位受訪者對他說：「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給你拍？因為我希望被捕的時候，有人記錄著。」另一位抗爭者則對他說：「原來我在 2019 年的經歷是真的。《國安法》之後，大家都不敢再說。」2020 年 7 月，中共繞過香港的立法程序，在香港實施《國安法》。當中分裂國家、顛覆政權、勾結外國勢力的定義廣泛而模糊。異見者或是噤聲，或者承受被捕風險，香港以往自由的生活方式從此改變。《時代革命》獲第 58 屆金馬獎「最佳紀錄片」，周冠威的得獎感言是：「盼望這部電影的存在，能給身處不同地方的香港人帶來一份安慰、一份擁抱。」

敘事結構

《時代革命》分為九個章節，以反修例運動中的主要事件作為標距柱。中間穿插十多位抗爭者的經歷，涵蓋哨兵、「家長車」車手、急救員、「阿爸」和「阿媽」等不同角色，展現抗爭期間的實際操作。相關的歷史脈絡和社會背景，則借學者（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、2014 年「佔領中環」發起人戴耀廷）、社工（「陣地社工」陳虹秀）、記者（《立場新聞》何桂藍）和評論人（時事評論員李怡、銅鑼灣書店林榮基）的訪問去交待。

周冠威在開機拍攝第一天，就確立了這套敘事模式，「將大事件、小人物平衡處理，是為了理性與感性的平衡。大事件有點似新聞報導，作理性的判斷、分析；但紀錄片的精粹是人情，要透過人物去表達。再把兩者交叉剪接。」「我有責任要傳遞這場運動的一切。當中有我並不 100% 認同的東西，例如『私了』（反修例運動期間，示威者多次遭暴力襲擊，但警方視若無睹。後來示威者開始執行私刑），可能我並不認同，但也要去呈現。這是站在運動的本質而行。」「創作需要要有個性，既要有主觀態度，同時又要客觀。因為作品是給其他人看，不是讓你自己開心、自我感覺良好而存在。」

無樣貌

基於安全考慮，《時代革命》的受訪者大部份蒙面示人，貫徹反送中運動「faceless」的特質，「最初，我跟所有受訪者說：遮臉可以，但我希望見到你的雙眼。這是電影人的執著。但到最後，你見到有些訪問，是後期用馬賽克遮住眼睛。燈光原本打得這麼美，這對一個對美學有執著的人來說，是非常痛苦的。」

從拍攝、到埋首剪接這段時間，香港的情況又再有翻天覆地的改變。搜捕不斷、加上《國安法》通過，抗爭者的處境越來越危險，周冠威終於放棄了他對畫面的執著，「我唯有用另一個理由，去抵擋我對美學的追求。就是這套紀錄片、這場運動，是無樣貌的。」「我承認，確實好多觀眾（對無樣貌）是抗拒的。但這帶出另一種感覺：這是一套很危險的作品。它不但不可以在香港放映，蒙住面的人，是承受著風險來接受訪問，讓所有觀眾看到。」「在美學上、人與人的交流上，好似斷開了。但這令電影多了一種氣質、一種情緒。」

面罩下是一個個怎樣的靈魂？導演透過一些細節，讓觀眾窺探他們的精神面貌。《時代革命》中有這樣的一個段落：一名十四、五歲的少年帶著自製的汽油彈，中途在背包裡翻船。行裝、衣服浸滿汽油，非常危險。但他令他懊惱的，是浪費了寶貴的彈藥，「這個片段，我有猶疑過是否要剪走。因為它無關整場運動的大敘述，但我對這畫面好觸動。」「他的對白大概是：『一個汽油彈要二十多元（港幣）！』作為成年人，二十多元不算什麼，我最初沒感受到那嚴重性。但他們是多麼重視。要記住，他們只是小朋友、中學生。」

「紀錄片不是新聞報導，不是單單紀錄事件。我希望講人性，他的脆弱、他的恐懼、他的失手。他甚至故作鎮定，對另一手足說：噢，不小心打翻了。」其實是掩飾年少低能，「是。太真實的人生。」「抗爭者蒙著臉，陰謀論者說他們一定是收了外國錢、是恐怖份子。但我在現場看到、拍到的並不是這樣。不要讓形象影響判斷。所以我把片段保留，給大家看。」

無大台

完成剪接後，周冠威把作品給受訪者過目，以確保他們心安。他問其中一位抗爭者：「這樣能不能保護到你？」「沒有問題啦，完全認不出是我。」「你怕不怕觀眾認不出你？」「沒有關係啦，裡面的人我一個都認不出來，但我全部都感受到了。」這正是「無大台」的體現，「我們成為了一個整體。不一定要記住某個人，但要記住這種感受、這種內心的呼喊。」而無面貌和無大台，乃互相扣連，「兩者成為了一個意念。意念就像子彈一樣，就是那種反抗，有好多 energy。」「這場運動（的模式）在歷史上從沒出現過。通常是有個魅力型領袖，演講好厲害的，或者以前的犧牲令他擁有道德高地，從而去鼓動人心。但這場運動沒有偉人，只有香港人。」「好坦白，人見到俊男美女就容易投入。連這些都省卻了，信念就更加彰顯。」

群眾運動自有其生命力，置身其中時往往不知道其所以然。周冠威當初對「無大台」的疑問是：「究竟怎樣組織的？為何可以沒有領袖，但發生這麼多事？」《時代革命》其中一個段落講述抗爭者是如何連結起來。他特意找一些無大台之下的組織者去訪問，「在片中只能簡化，但當我了解他們所講的一切後，真的覺得很有趣和震驚。」例如家長車頻道、地圖小組的管理員，照顧未

成年抗爭者的「阿爸」和「阿媽」等，「阿爸跟他的『子女』原本互不相識，但能夠結合起來一起去付出，是這場運動的一大特色。」

自由意志

無大台的基礎，在於每位抗爭者的自發、協作與互信，並朝著共同目標各盡其力。其中一位受訪者「Nobody」本身是 Uber 司機。在 2019 年 6 月 9 日的 100 萬人大遊行後，香港政府堅持《逃犯條例》修訂案如期在 6 月 12 日二讀和三讀。既然和平遊行沒有用，Nobody 隱若覺得要做點什麼。有朋友傳了 Telegram 的「612 公海群組」給他，他對號入座加入了「車手頻道」。初時大家只有模糊的目標，就是要在金鐘一帶堵路。Nobody 開始整理雜亂無章的訊息，漸漸生出行動計畫。車手們各自駕車去現場製造「交通意外」，把車子打橫停在路上、拋錨，以阻截警車的去路。現場漸漸有其他車輛加入，造成更大效果。這樣的行動試過幾次後，被警方知悉，他們又變陣，成立「家長車頻道」，在衝突現場義務載抗爭者離開。

Nobody 的例子顯示了反修例運動由下而上的動力。透過網絡，抗爭者會合成細胞組織，因應事態發展而整合或分散，既流動又機動，前設是每個抗爭者都擁有自由意志，會尋找適合自己的崗位，並互相補位。香港自 1842 年開埠以來，其角色就是自由貿易的殖民地，自由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早就根深蒂固。1949、以至後來因為中共的政治運動而逃港的難民，都是為了尋求生存的自由而來。香港乃以自由建城，「香港電影現在好坎坷啦，對世界影壇的影力實在太低，本地市場完全被荷里活（好萊塢）片佔據。但我成長的年代，是香港電影最輝煌的年代。為何成功？就是因為自由。」「香港電影在 97 後，確實慢慢失去這種吸引力。好無奈。」與長期被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人相反，香港人習慣自主，遇事不會仰賴政府或上層組織的指揮，令「無大台」的抗爭機器得以運作。

《時代革命》本身也是協作的結果，「我的優勢是能夠與示威者建立信任。因為我拍過《十年——自焚者》，他們認識我、願意讓我拍。那我就拍人好了。個別事件，就用其他傳媒的片段去建構。」周冠威首日開機拍攝，就遇上「831 事件」、警察在太子站無差別襲擊市民。事發突然，他錯過了那班列車，

也就錯過歷史時刻。周冠威意識到不能靠一己之力紀錄整場運動。得道多助，《時代革命》片尾寫著「香港人作品」。

電影中有很多浩瀚的場面：螻蟻般的抗爭者被水炮車驅趕，他們如水銀般散開。傾刻間，街上只剩下藍色的化學液體，令馬路變成河流。周冠威想到用航拍去表達，但資源所限無法成事：「怎樣可以表達『be Water』的概念？想到，但做不做，我是好失望、不開心的。或者是自己沒有決心去實現這想像。」一年半後，他在網上看到心目中的鏡頭。有航拍愛好者把自己的作品放在 Youtube，周冠威聯絡對方，對方一口應承提供片段，「這是天賜的禮物。成就了這一段，去講這麼抽象的概念，我自己都被震撼。」

公民社會

「無大台」亦體現了香港公民社會的強大。公民社會在香港的發展其來有自。殖民時代，英國在香港實行「無為而治」。在 1970 年代之前，除了基本的市政和法治之外，港英政府對香港的教育、醫療、房屋以至社會福利其實無甚建樹，但也沒有採取高壓管制、或高舉意識形態，香港社會基本上是自由的。1967 年香港發生左派暴動，中共曾蘊釀派兵南下。但當時中共仍處於鎖國狀態，需要香港作為對外聯繫、交換物資、賺取外匯的渠道。權衡利害後，中共決定暫且維持現狀。但英國從此改變了對香港的管治策略。

1971 年，港督麥理浩上任，在基建、廉政、社會政策和行政制度各方面，均有大刀闊斧的改革，目標是加速香港的經濟發展，令香港成為中國不能割捨、又不忍摧毀的軟肋，從而增加英方的談判籌碼。改革的效果，是令香港社會進一步自由化。壓力團體、公民社會組織開始出現，成為 80 年代的政治團體、以至 90 年代初政黨的基礎。獨立媒體搶佔輿論市場。香港人發現自己原來可以就社會事務發聲，漸漸建立起公民身份。

在 80 年代初的前途談判，香港人被中英雙方拒諸門外。市民在公共領域仍難以得到充權的機會，但公民社會已成形。八九民運無疑是香港民間力量的首次大規模爆發。不同階層的團體用自己的方式去支持北京學生，連色情雜誌《龍虎豹》都發起義賣，因為「今日北京愛國民主運動遭鎮壓，覆巢之下，明

日香港豈有完卵」(《龍虎豹》在 1989 年 5 月 27 日刊登的廣告)。

八九民運也成為許多香港人覺醒的轉捩點。1979 年出生的周冠威當時唸小四，家中有兩台電視機，客廳播無線、睡房播亞視（當時香港只有兩個電視台）。他左、右兩眼各看一台，房門門框就在中間。由 4 月開始，他目睹整場民運的過程，「什麼是國家？為何學生們不吃飯？為何會這樣表達？」「當時我不懂『覺醒』這個字詞。後來我回顧自己的人生，是那幾個月令我覺醒。原來我有多一重身份，叫做『公民』；原來我有多一份責任，不只是為了自己，也不單是爸媽的兒子，而是為了世界。」「學生們的犧牲，大大改變了我的人生。」「八九民運雖然失敗告終，但它影響人心到哪種程度，大家都知道。2019 年香港的抗爭，也是失敗告終。但這只是表面上的失敗。那種人性光輝的綻放、正面的影響力，我覺得跟六四一樣大。」

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年輕人，有很多都表示自己是受到六四事件的影響。他們對六四事件的認知，或是因為老師、傳媒的介紹，或是家長帶過他們去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晚會。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（支聯會）是紀念六四的專業戶，也是香港重要的公民團體之一。但《國安法》通過後，支聯會跟很多香港的公民組織一樣，已被迫解散。現時反對派要在香港舉行集會，基本上是不可能。但已醒過來的香港人，又很難回去裝睡，「每個人的覺醒都不同。有人可能是 2012 年反對國民教育、黃之鋒的抗爭，有人可能是 2014 年的雨傘運動。2019 年是更大規模的覺醒。正如李怡先生（《時代革命》的受訪者之一）所講，這是全世界的覺醒。中國的極權可以對文明社會破壞到什麼程度，在香港已示範了一次，給世界一個很大的警惕。」

殉道者

受六四事件啟蒙，「犧牲」成為了周冠威重要的人生課題，「作為一個小學生，面對這麼多人的犧牲，他們的執著、勇氣，示範了一個榜樣，對童年的我是好大的震撼。」他主要作品的母題都離不開「犧牲」二字。《十年——自焚者》（2015）問的是「你願意為民主犧牲多少？」《幻愛》（2020）是「你願意為愛情犧牲多少？」《時代革命》則是「你願意為自由、公義犧牲多少？」

在電影路上，他也不斷拷問自己「願意為電影犧牲多少？」在考入香港演藝學院之前，周冠威因為討厭考試，輟學三年。後來半工半讀、重考了三次，才成功考入電影系。然而香港電影工業廢弛已久，周冠威的收入一直極不穩定，拍攝《幻愛》時更要靠借貸維生。《幻愛》的成功（香港票房超過 1,500 萬港元，是少數單靠本地票房而有盈利的香港電影），令周冠威獲得開戲的機會。但隨著《時代革命》面世，新片的投資者即時退卻。為了具名發表《時代革命》，周冠威犧牲了他的電影事業，「我自己拍的（電影），我自己負責任。這才是公義。」「我是個理想主義者。追求一件事、一種價值的時候，要義無反顧。是正確、值得的話，就要考慮犧牲其他的一切。無論是追求電影、還是公義，都是這樣執著。」

佛地魔

「光復香港、時代革命」在香港已成為不能說的佛地魔。人民力量前副主席譚得志在 2022 年 4 月被判囚 40 個月，理由是他曾多次擺街站、呼喊「光復香港、時代革命」及咒罵警員的口號，被控以煽動罪。《國安法》通過後，首宗案件的被告唐英傑，因為駕駛插有「光復香港、時代革命」字樣旗幟的摩托車，撞向三名警員，被控以「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」和「恐怖活動罪」，判囚 9 年。周冠威面對的政治風險可想而知，「坎城影展後最初的幾個訪問，我是非常之凝重，甚至有種感覺，像講遺言那樣：這是最後一套電影、這是最後一個訪問。當然，我此刻做訪問，可能明天就會被捕。但在坎城影展時，那感覺更加強烈。」

對於《時代革命》登上世界舞台，周冠威感到很寬慰，「我對得起投資拍這部紀錄片的人、對得起陪我冒險的受訪者、對得起自己。」但無論是坎城影展、還是金馬獎頒禮，他都沒有出席，怕一出境便回不了香港，「留下來是我的使命。我留在香港才是自由。離開就是被恐懼箝制，因為你是害怕才會離開，這是我無法接受的。我寧願面對被捕、成為政治犯的風險，也總比輸給恐懼要好。」山雨欲來，現實卻是一片平靜，「到這一刻，我沒有被跟蹤、被恐嚇。我有朋友被警察、或者大陸來的國安約談，但我沒有。」

周冠威唯一一次受到騷擾，是在 2021 年 8 月底。一名區議員在其辦事處

舉辦《幻愛》私人放映會，食物環境衛生署及警方到場「放蛇」，稱在場人士違反限聚令（香港因為疫情，不准在公眾場所群聚，但私人聚會不受限制），向包括周冠威在內的 47 人發出告票。周冠威拒絕繳交罰款。現場除了食環署人員和警察外，根本沒有陌生人。警方最終在 2022 年 4 月 7 日撤回告票。「如果我因為拍紀錄片而被捕，是荒謬；我沒有被拘捕，也是另一種荒謬。」「人治才會出現這種荒謬。法治就是有規有矩，有根有據。你做過什麼是法律不容許的，就會被捕。但現在的香港不是這樣。」「《時代革命》是我的催命符，亦是我的保護罩。可能它（政權）不想這套片受到更多關注。我跟《時代革命》連成一體，如果我被捕，就是這套片最大的宣傳。以後每次在世界各地放映，都會交待導演的下場。」「犧牲不是送頭。這是稻草人、假議題。犧牲一定有其意義，除非你在沒有深思熟慮的情況下，不知道為何而犧牲。」

身份認同

正是這種犧牲，令香港人在反修例運動中冶煉出族群身份。正如前文所述，周冠威在這場運動中獲得勇氣，更多的香港人從中得到身份認同，「香港人是聰明的，但往往會把聰明用在走位、賺錢，甚至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上。到 2019 年才發現，原來這麼多香港人會用這份聰明去做有意義的事。甚至願意為抽象、形而上的價值，例如民主、自由、公義，犧牲到這地步，這是我猜不到的。你都可以說我是看扁了香港人，但原來『死唔晒』（沒死光），不用太悲觀。」

憤怒是一時，犧牲卻需要長久的堅持。《時代革命》中一位受訪者提到自己「藉憤怒保持抗爭的動力」，因為警察的暴力太離譜；緊接另一位受訪者則表示，「光靠憤怒這場運動是不持久的。」因為雙方的武力太懸殊。周冠威有意讓他們隔空對話，「片中好多受訪者的意見其實是相反的，或者互相補充。我想電影不止有單一立場，而是有辯證的效果，讓觀眾去反思。」「憤怒是需要的。為了不公義而憤怒，是出於良心、是見義勇為的動力。但你問我個人的動力來源，我覺得是希望。盼望為美好的將來去發聲、去抗爭。」

